



■青春岁月

高原上的神仙眷侣

□李荣欣 文/图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。照片上的两位青年人，是一对新婚夫妇，男青年叫廖华民，当时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汽车连战士，女青年叫胡玉芬，当时是四川省射洪县一个区供销社会计。

说起他们的婚事，还有一段故事。1978年，廖华民从家乡四川射洪县，入伍进藏分配到日喀则军分区汽车连当战士。1981年回乡探亲时，认识了在区供销社当会计的胡玉芬，并确立了恋爱关系。胡玉芬是当地的大美女，加上有工作，吃商品粮，又是干部身份，追求她的人很多。可她却偏偏看上了一个在雪域高原西藏当兵的小战士廖华民。而且，当时廖华民的家里很穷，连三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这让人很不理解，很多人都对他们的恋爱持反对态度，包括胡玉芬的父母。

廖华民也觉得他们两人身份悬殊太大，也劝胡玉芬把恋爱关系中断，当一般朋友来相处。可铁了心的胡玉芬却对她父母说：“华民这人忠厚、实在，有上进心，人靠得住，和他在一起生活，有安全感。”又对廖华民说：“只要咱俩相亲相爱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干部和战士其实都是一样，只是分工不同，没有贵贱之分。现在政策好，你在部队提不了干，回来给人开车照样能发家致富。我是看上你这个人。一不挑剔你的家，二不挑剔你是战士。不管别人咋说，我都要嫁给你。等明年夏天，你服役期满，我就进藏和你结婚。”

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，廖华民就假满归队了。当时，他认为

胡玉芬无非是当着他的面表白一番，等他假满离开就会拉倒，并不把她的话当真。谁知道，8月份，他正在千里外的某边防哨所开车倒运战备物资，连里给他发去一封电报，说他未婚妻来队了，让他速回连队完婚，这让他吃了一惊。

原来，执拗的胡玉芬怕廖华民知道后工作上分心，也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没把她进藏的消息告诉他。而是一个人顶着社会舆论和父母兄妹的劝阻，单枪匹马地搭便车，走川藏路进藏了。那时的川藏公路，路况差、行车难、车速慢，走了十多天才到拉萨，而后她又搭便车到了日喀则。

听了胡玉芬的陈述，汽车连的领导很受感动，立即给他们腾出一间营房当新房。等廖华民回到连队，全连干部战士集合在一起，给他们举办了一场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。连长说：“你俩的婚礼在西藏高原举行，珠穆朗玛峰祝福，雅鲁藏布江致贺，是够隆重的了。可美中不足的是，因为缺乏红纸，连个大红喜字也没贴。”廖华民质朴地说：“在连队举行婚礼，连队这么重视，是对俺最大的祝福，大红喜字就贴在俺的心里了，俺一辈子也忘不了部队的深情厚谊，将来俺的儿孙们也要记住。”

就这样，这对“身份悬殊”的有情人，成了眷属。现在女干部和小兵成婚都很稀奇，那时更是一件天大的事。所以，他们的婚事，成了一段佳话，在雪域高原上传扬开来。

■家庭相册



父亲的照片

□岳新敏 文/图

一天，一位杂志编辑打电话过来，说我那篇关于父亲的文章，准备采用，不过要附上一张父亲的照片。

这有什么难的，我满口答应晚上就给他发过去。可是翻遍全部相册才发现，我的电脑、手机还有相册里竟然没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。我有点傻眼，难道父亲在我的生活里如此真空？

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给父亲拍张照片呢？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父亲是严肃的，呆板的。他年轻时当过兵，现在身上还有当兵的影子。不苟言笑，感觉他很不容易亲

近，尤其是在我犯错的时候，他的一个眼神就足够让我胆战心惊。

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坚强的人。我从来没见过他流眼泪，包括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姐弟仨都在上学，父亲做建筑工给我们挣学费。他每年都要出去打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。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，每每父亲回来便缠着他要这要那。邻居小花有一个好看的发卡，而父亲竟然没有给我买，我发脾气不理他，甚至拒绝和他一个桌子吃饭。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离开去北京打工了，而我床头放着一个漂亮的发卡。

母亲说，这是父亲连夜到镇上买的。三十多里的路，难以想象，寒冷的冬夜，他竟然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只为给女儿买上一个发卡。我悔恨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那年冬天，父亲做工时，从二楼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当时我正读高二，父亲叮嘱母亲不要告诉我，怕我担心。放假的时候，当我一进家门准备把催缴学费的单子递给父亲的时候，只见他躺在床上，腿上打着石膏，额头上渗出微微的细汗，有气无力。

一刹那，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。我实在不忍心拿出学费单给父亲的伤口撒一把盐。弟、妹还小，不能辍学，我告诉父亲不想上学了，反正凭我的成绩也考不上大学。可是父亲的眼神迸发出愤怒。

怒，用他那没有力气的手打了我。

“不上学有什么出息，如果你争气的话，就好好学习，农家孩子只有这条路。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的那种眼神，每当我遇到挫折不想坚持的时候，我总能想到那眼神，于是又有了坚持的力量。

后来，是细心的母亲发现了我的学费通知单，把钱悄悄给了我。终于，付出获得了回报，我考上了一所二本学校，在当时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，我也好像从那天起突然一瞬间长大了。

父亲走路有点跛，是那次受伤留下的后遗症，不能再干繁重的体力活儿了。年近六旬，已是花甲之年，却不肯“退休”，当然，农民是没有“退休”的。干不了重活，他就开始跑零活儿，为附近工厂买买菜，看看大门。

每当看到父亲走路的姿势，我的心就很痛。我所前进的每一步，都是父亲用他的全部换来的。所以我从不敢停歇，以至于同事都说我是“拼命三娘”。他们不知道，父亲的付出又何止是我的努力所能换回的。

而今，我们姐弟三人工作繁忙，不能在父母膝前尽孝。结婚后，我更是生活重心都放在家庭和孩子上，和父亲的交流少了。相册里满是孩子的照片，竟没有父亲的身影。

“爹，我要给你拍张照片，一张你自己的单人照。”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

■图片故事

飘在记忆里的风筝

□王贵宏 文/图

我现在住的地方倚山而建，门前的一条小街不仅窄小，街旁的树木更与房屋勾肩搭背，实在不宜放风筝。有次路过一个广场，见一位老者在那放风筝，细细的线顶端是一只缓缓飞翔的大鸟。在碧蓝天空的背景下，风筝艳丽的身姿吸引了许多行人驻足昂首。我自然也停下脚步凝眸观看。

几个孩子围在老人的身旁，脸上满是新奇的神情。仿佛那只愈飞愈高的大鸟牵引着他们无际的遐想。这也让我想起童年放风筝的故事来。

我的家乡是平原，四季流浪的风无遮无挡地吹来刮去，春秋两季都可以放风筝。放的地界儿首选场院，场院像村庄的海，平坦宽阔，是我童年的乐园。东北农村扎风筝多用秸秆，也有用竹子做骨架的。但竹子是奢侈品，不是家家都有。

秸秆则随处可见，可它不结实，做的风筝飞不甚高，风大更容易散架。许多同伴的风筝大多是以“燕子”或“彩蝶”，我常表示不屑，认为他们做得小，且飞得低。

有次我用剥皮的干柳条做的“蜈蚣”与邻家小伙伴用竹子做的“老鹰”在天上相遇，它们纠缠在一起，落下时“蜈蚣”支离破碎，“老鹰”却完好无损。气愤之余，我回家斗胆偷了老舅钓鱼的竹竿儿，用柴刀劈成细条，



又做了个更大的“老鹰”，可因其过重，它懒懒地如何也不肯起飞，弄得我悻悻地一时无计可施。

这件事的结果是惹得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老舅对我横眉立目，屁股上挨了他两脚作为惩戒。他踢完我后将那只“老鹰”掂在手上仔细研究了好一会儿。我当时认为他在心疼鱼竿儿，极担心他会把风筝毁损。正在我绝望之际，他却出乎意料地指出我制作的弊病来，并态度平和地坐在矮凳上帮我拆开重做，这件事使我大受感动，此后唯他命是从了。

一连几日，我那只“老鹰”一直展翅高飞。飞得越高，老舅用墨汁在风筝的牛皮纸上画的那鹰头、鹰翅越逼真。孩子没长性，后来玩倦了，我用它与同伴换了几册小人书，结束了一段对放风筝的痴迷。

从乡村走出来，我感觉自己像风筝，无论飞得多高多远，那线永远在故乡的手里。那根线，始终缠绕着我怀念的童年。



为自己加油

□周铁钧 文/图

前几天，在一家小饭店吃早点，店老板竟是我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。故人相逢，分外亲热，她极力邀我到家里坐坐。

她住在店附近的一座简易楼房里，只一间屋，摆设极为简单。我坐在屋中唯一的沙发上与她聊了起来：“小饭店大都是外地人经营，你一个本地人怎么干起费力挣不来大钱的买卖？”“都是让监狱逼出来的。”“怎么？你……”“不是，两年前我那口子酒后驾车撞了人，被判了三年刑。那时我也下岗了，生活没着落，头发都愁白了。我去监狱看他，他说你再难还有我坐牢难吗？他的话还真提醒了我，外地人都能抛家舍业来咱这儿挣钱，咱守在家门口挨饿受穷，说不过去呀。我就在心里给自己判了‘刑’，盘下了这个小店。”

听她淡淡的表述，我眼角有些湿润：“你现在快‘出狱’了吧？”我玩笑着想缓和一下情绪。“哪儿呀，还有一年多呢，到时候说不定我还要给自己‘加刑’呢。”她指了指窗外林立的高楼：“等我盘上体面的店，你要放鞭炮接我‘出狱’。”说罢，我们一起笑了。

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，双脚可以毫无约束地迈向任何一个方向，眉宇中却坐落着一堵高陡的“狱墙”，拦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，挡住了通向成功的视线。